◎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期刊篇⑥

它是年轻的，勇敢的，也是理性的

——《花城》主编朱燕玲访谈

何　平

先锋是一种精神气质

何　平：广东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前沿。《花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花城》创刊之初，其“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的办刊方针显示出它视野的开放和包容。《花城》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赋予《花城》怎样的精神气质？

朱燕玲：《花城》诞生于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人激情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创造力被大大激发。广东人思想开放，在历史上有革命的传统，此时划为改革的前沿试点地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更加凸显。又因广东地理上毗邻港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客观上得到海外资讯的便利大大强于内地，这才使得创刊初期的《花城》有可能设置那么丰富的栏目，打破常规，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介绍国际文坛的作品和思潮。40年后的今天再翻看，仍然能感到一股海洋之风扑面而来。可以说《花城》诞生在一个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根植于沿海的土地，先天就带有了开放的基因、敢作敢为的精神气质。

何　平：《花城》有诸多有影响的栏目，比如1983年的“作品争鸣”，1994年的“新小说”，1999年的“实验文本”，2004年的“花城出发”，2016年的“新媒介文艺前沿探讨”，2017年的“花城关注”……《花城》被文学界称为“先锋文学的摇篮”。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先锋”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作为《花城》“先锋转型”的参与者想必你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能具体谈一谈吗？

朱燕玲：在我看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作品与争鸣”栏目来自于创刊早期打破禁区的强烈愿望。“新小说”栏目设立后推出了小说家韩东以及新人朱文和李冯，可以说及时抓住了上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重整旗鼓“续航”远征的契机。为什么大家现在常说《花城》是先锋文学的摇篮或者先锋文学的重镇？我想是因为《花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刊登先锋作家的作品，虽略晚于《收获》，但保持先锋的姿态更持久，而这些在《花城》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也更持久更鲜明地保持着先锋的个性，直至今日。我觉得，不要狭隘地理解先锋。先锋应该是一种精神气质，它是年轻的，勇敢的，也是理性的。它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单说技巧，它在今天也已经不知不觉融入到几乎所有作家的写作之中。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吧。

朱燕玲

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

何　平：《花城》四十年并不是只追求先锋性和实验性，我的阅读观感，《花城》同样是改革开放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你有着怎样的理解？

朱燕玲：这里的先锋性和实验性，都是指文本意义上的。而我更愿意将先锋扩大至一个精神性的层面。这样理解，才更能看出《花城》40年办刊，其实有一条线贯穿始终：40年来，虽历经多任主编，风格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由现实主义基调、报告文学主打，到实验色彩渐浓、鼓励文本创新，到文学策展、品牌运营，都无不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和独立担当勇气，每一任主编都很珍惜这个纸墨园地，不敢懈怠。

何　平：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前后，毕飞宇、李洱、韩东、北村、吕新、陈染、林白、艾伟、东西、鲁羊、朱文——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这些当时的青年作家最重要的小说几乎都发表在《花城》。他们的年轻锐气带动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花城》今天依然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你觉得今天的青年作家群体和当年这个青年作家群体之间有差异吗？

朱燕玲：是的，现在看，这个阵容十分强大。但当年他们也是一个个扎扎实实冒出来的。现在，最大的“90后”也快30岁了，而当年那批作家，在这个年龄，已经各自有非常不俗的表现。虽然“90后”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和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是必然的结果。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更有个性的作家一个个脱颖而出，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花城》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寻找这样的新人。

何　平：《花城》的诗歌栏目对汉语诗歌，尤其是长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早期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诗人都在《花城》有诗作发表，《花城》有没有自己的择选标准和尺度？

朱燕玲：《花城》确实一直保持对诗歌栏目的高度重视。《花城》之所以坚持刊登组诗、长诗，是觉得推出一个诗人要有充分的说服力。组诗或者长诗才能较完整体现一个诗人的风格和面貌。我认为好的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应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感知众生，悲悯为怀。我不反对写日常、写细小的事物，但我反对口水诗。我还认为所有好的文字都该有诗性——小说、散文、甚至评论。优秀的诗歌是可贵的，因此诗歌不能沦为版面的补白。

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

何　平：《花城》是重视文学文化批评的文学杂志，设有“花城论坛”“现代流向”“思无止境”等栏目，这两年还有“域外视角”，诸如陈晓明、程光炜、谢有顺、王一川、陶东风、南帆、王岳川等人都在《花城》上发表过评论文章，《花城》的文学文化批评更注重什么？

朱燕玲：《花城》这一块的栏目名称多变。“现代流向”栏目曾经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的文章，既有学术性也有思想性。而“思无止境”栏目，可以看成是“花城论坛”和“现代流向”的合体，再加上“花城关注”栏目里的点评部分，一起形成每期刊物里有点有面的效果，反映出对当下文学现场的观察、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评判。“域外视角”注重的是海外资讯，我发现对同一个问题的解读，海外有可能提供非常不同的视角，在思维方式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而和北大网络文学研究院的合作，则源于我的一个想法：要研究青年写作就必须研究青年兴趣，而青年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个特约栏目，借北大师生的视野，引进他们对前沿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一本原创文学期刊里的文学文化批评，往往是点睛之作，应反映出办刊者的观点、眼界和趣味。《花城》首先排除掉太学院派的学术论文，更注重发现和表达，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实际上接近学术随笔。

何　平：2017年，我开始和《花城》合作“花城关注”栏目，你的预期是“集《花城》品牌栏目‘花城出发’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的实验性为一体”。时至今日，这个栏目已经坚持快3年了，不知道这个栏目是不是达到你的预期了？

朱燕玲：这个栏目的效果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成为了我们的王牌栏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原来的设想是做一个能够及时反映文学现场的栏目，尤其是反映青年的写作状态，相当于一个文学观察员，这个观察员不能是个书斋里的评论家，必须要有巨大的阅读量和新锐的学术思想做基础，要非常关注年轻作家并有经常的互动，要既敏锐又有行动力。“花城关注”栏目除了有访谈，还增加总评，突出问题意识。

何　平：《花城》以“独立精神，人文立场，新锐主张”为办刊宗旨。面对当下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形势，《花城》的办刊理念会作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文学现实？

朱燕玲：载体的改变固然会影响对内容的需求，但内容为王不会过时，我们仍然有用武之地。相反，网络的发达，反而使纯文学的传播也有了新的途径。我们应好好利用这些途径。虽然纯文学小众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多元的社会提供了拓展文学边界的机遇，跨界的、跨阶层的、跨年龄的……不断革新的文学才会有生命力，开放、融合才会推动社会发展。原有的办刊方针依然适用，那是我们追求的精神高度，是《花城》的品牌价值所在。我们会以纸刊为核心，做更多尝试，搭建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总之我们在做的是有关心灵的事业。

◎百家谈

漫议海外华文文学的非虚构倾向

汤　俏

当下，一种新的创作潜流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渐次凸显，一部分华文作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种非虚构转向，尤以历史叙事文本为著。这种创作倾向的转变，自然受到当前世界范围内非虚构创作潮流的影响，也与中国当下文坛主流媒体的导向有关，但更多的是一种生发于文学内部自身生产的需求。

移民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支，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华工出口和公派留学生所留下的域外生存所见所闻实录，所谓“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开启了华人在北美苦难生活的记载。从“留学生”到“学留人”、从“花果飘零”到落地生根，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移民文学”也在早年作者初涉异国他乡之时，曾经忠实地记录了在故国乡愁和文化冲突的双重困境中，移民个体在中西异质文化空间中所遭遇的极致生存体验。既有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苏炜《远行人》、阎真《白雪红尘》等“大陆留学生文学”为先声，亦有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卢新华《细节》等这类“十年一觉美国梦”的生存笔记。从“边缘人”到“世界公民”这种生命移植异域生存的纪实性创作也是切合我们今天所谓“非虚构”叙事特质的，只是那时这个概念尚未在大陆文坛风行。

张翎的《金山》是一部以清末民初赴加拿大淘金的先侨、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为主要人物的历史小说。小说家以细密的考证态度、不厌其烦的铺陈以及文类的互渗来增进叙事的历史感，由此形成小说厚重的历史氛围。陈河的域外战争书写系列是具有典型非虚构写作特征的文本。他总是力求最大限度接近历史，展现了在虚构与真实之间较强的转换能力。《米罗山营地》是反映二战时期马来西亚多族裔抗战历史的战争题材作品。陈河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工作，现场的行走结合对回忆录、纪录片、专题访谈、口述历史的细致研究，在虚构的书写里尽量呈现非虚构的力量。对于家族历史的回溯与呈现也是非虚构写作中引人注目的一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小华的代表作《忽如归》，以一种非虚构纪实文学的面貌呈现了“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命运，对我们了解当时台湾的社会政治状况具有实证的意义。

还有一些非虚构写作也值得注意。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的非虚构文本《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力图从史料中钩沉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与安阳殷墟甲骨文之间的渊源；理想主义情怀观照下的“白求恩系列”《尺素天涯》和《何处不青山》则致力于发掘符号化背后血肉丰满、鲜为人知的鲜活形象。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在搜集研究了大量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文学的手法和历史研究的态度还原了“二战”时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飞虎队”在中国抗战的历史，但其落脚点在于对中西价值观的文化批判和对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注。此外，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叙事中还有一部分借由历史叙事的框架来谱写传奇故事的文本，比如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表现出一定的非虚构意识。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中，作家始终坚持有史可查、有据可依，以历史寻访、记忆回望、材料整合等手段立足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可以允许作家合理的想象和情节位移。作家通常以“零度叙述”的写作策略积极介入历史现场，但这种介入一般是“微观化”和“现场直击式”的，他们在搜集、甄别材料的同时已经内化成叙事文本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由于其移民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更便于发掘独特的题材、打捞历史真相，从而呈现出与国内作家聚焦于乡土题材、底层书写的非虚构写作不同的叙事风貌。需要强调的是，当前这个领域所呈现的作品尚不能支撑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潮流存在的力证，但它们都确确实实地体现出作者有意识的非虚构创作转向，并且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一个女人命运的“他乡”

程　旸

他乡与故乡，在跨入城镇化大潮的当下中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敏感话题，亦是矛盾的焦点。作家付秀莹的长篇小说新作《他乡》跨越20多年的时间，是一个女人的心灵成长史，也是伴随其后的时代编年史，鲜活地记录了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上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最初10年北京在快速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变化过程中日新月异的时代气息。

付秀莹的“他乡”是女主人公翟小梨以超人的忍耐力、顽强的韧性和不懈奋斗争取的强悍毅力，努力占据立足的制高点。这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精神之所在，也是茫茫人海中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个体多年努力誓要到达的理想彼岸。而在奋力抵达它的漫长过程中，每一个拼搏奋斗的个体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以及伤害、屈辱都是不足为外人所道的，也是推动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所在。《他乡》真实地记录了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一个女人在家庭、社会中遭遇的种种曲折磨难，最后通过自己的顽强拼搏，破茧成蝶的心灵史与奋斗史。作家小说语言的细腻，情感的充沛，带有荷花淀派余韵的优美雅致，情深意切的叙述口吻，使得这部作品拥有了别具一格、不落俗套的艺术表现。

《他乡》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它的故事，是一个有理想、受过教育、有追求的时代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束缚中努力突破重重壁垒的艰难经历。翟小梨在芳村长大，上大学时结识了来自省城的男友，怀着对大城市美好生活的想象嫁到了省城的小知识分子家庭。没想到生活的不如意接踵而来，女主角决定奋力一搏，考研到了北京的大学。女主人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重新做回了自己。一家子在经历了种种濒临破裂的危机后又生活在了一起。半生的不懈奋斗也让女主人公的内心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与过往和解，开始了一段新生活。就是这样看似与很多人的人生经历相似的故事，在付秀莹的笔下焕发了崭新的光彩。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相似的，可每个人内心的丰富、曲折、纠缠、和解却是各有各的不同。毕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付秀莹或许是深谙这一秘密，她用情感深厚、丰富细致的文笔绘声绘色地写下了翟小梨欢乐与心酸交织的半生。心理描写的精细入微、内心活动的波澜起伏都被作家详尽地展现了出来。这就丰富了一个本就饱满的故事的骨架，给读者带来了愉悦和伤感交织的阅读经历。翟小梨生活中的每一次改变都是源于人生的不顺与打击，是被生活的艰险困阻推动着被迫前进，从而激发了强烈的斗志。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每一次变革背后都凝聚着千万人的不懈挣扎奋斗，用百倍的勇气与毅力，打破自己命运的天花板。正是无数像翟小梨一般的人，拼尽全力奔跑着冲向自己命运的“他乡”，才有了时代的前进与革新。想必这也是付秀莹这部作品的深刻隐喻所在吧。

付秀莹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诗与剑”的俄罗斯民族

周晓沛

俄罗斯被称为是一个“诗与剑”的民族，俄罗斯文化也浸透着“诗与剑”的深刻内涵，而诗人普希金则是俄罗斯文化的突出代表。俄罗斯人酷爱文学，崇拜文学。1880年，在莫斯科市中心为普希金树立了铜像，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座为诗人建立的纪念碑。100多年来，仅莫斯科市内就有上千座的诗人、作家和其他名人纪念碑。无论你走到俄罗斯的哪个城市，到处可见为文学家树立的纪念碑以及保存完好的故居博物馆。无论到哪个俄罗斯朋友家做客，你都可看到家中陈列的各种文学名著。2018年，俄罗斯政府决定将历史上的“伟人姓氏”重新命名国内47座机场，莫斯科最大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改为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这也彰显了俄罗斯人对文学先驱的崇拜和怀念。

俄罗斯人对文学的特殊爱好，可能与其独特的民族性格有关。俄罗斯东西方文化交融，既有斯拉夫人的豪放、粗犷，又有诗人般的激情、浪漫。

19世纪是俄罗斯文化的空前繁荣期。俄国文坛上，先后有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启蒙主义几种流派，从19世纪20年代起浪漫主义占了主导地位，而反农奴制的斗争促进了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变，19世纪后半期是俄罗斯文学高峰期。19世纪涌现了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一大批文学泰斗。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普希金奠定了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基础，确立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规范。

俄罗斯文学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尊重。2014年索契冬奥会，当《战争与和平》的女主角娜塔莎参加舞会的华丽芭蕾舞场面出现在开幕式上时，场上爆发出掌声和赞叹声；闭幕式上，普希金、托尔斯泰、契柯夫等俄国历代文豪都展示在大屏幕上……中国人也是更多地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认识俄罗斯民族，并从中获得无穷的力量和美的享受。20世纪初，中国翻译的第一部俄国文学作品是普希金的代表作《上尉的女儿》。《叶甫根尼·奥涅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等经典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

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作家王蒙在《苏联祭》中写道：“如果我的青年时代有四个关键词，它们是革命、爱情、文学与苏联。”

我曾三次前往托尔斯泰故居参观，每次都受到心灵的洗涤。令人感兴趣的是，托翁还有一段不解的中国情结。在去世前半年，托翁说，“假如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到中国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托翁愤怒揭露和谴责了英法联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1900年，他又发表了题为《不准杀害》的政论文章，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提出了严正抗议。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托翁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真研读了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人的著作，对孔子的“修身”思想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王国赞赏至极。这种影响在托翁的“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中都有反映。迄今，在他的书架上还保存着孔子和老子等中国先哲作品的俄文版译著。托翁的思想和创作，对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托翁的洗礼。

普希金铜像

传记文学《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出版

本报电（文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日前在京首发。本书作者为94岁的于是之夫人李曼宜，她在书中记录下了她与于是之风波迭起、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讲述了他们风雨同舟相扶相携60余载的人生经历。本书起笔于1949年的相识相知相爱，更有于是之此后60余年里在话剧表演事业和个人命运上的艰难跋涉，道出了风光无限的演员生活背后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这本回忆录质朴平实，细腻动人，从中可看到这对伉俪贯穿一生的深爱和信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濮存昕把于是之称为演艺这一行当至高无上的典范，是艺术的殉道者。